

一、经济专论

西部大开发的几个关键问题

—成思危—

一年多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掀起了西部大开发的热潮。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概括地讲有四个方面：第一，缩小地区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东西部之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增强综合国力。第四，努力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不仅对西部地区，而且对实现全国的可持续发展有促进意义。

我想结合一年多来所见所闻、调查研究以及个人的思考，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谈谈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该重视和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西部大开发要树立正确的观念

实施西部大开发，我认为四个观念很值得重视。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

大家知道效率和公平在经济学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国家应该把效率和公平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一方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另一方面要保持社会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如果单纯从投资的经济效益来看，西部地区总体上肯定比不上东部地区。不过我们不能孤立地只看眼前的经济效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把开发的重点转移到西部地区，这不仅是地区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反过来讲，西部的同志们也不能说，我只要公平，就不要再讲效率了。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条原则很重要，应当坚持两点论，要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西部大开发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别是对一些弱势群体，对特别落后的地区，不讲公平不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过去因“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经济发展很慢，传统的计划经济这条路走不通了，因此采用市场经济的模式，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促进经济有效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市场的作用，不强调社会主义本质，甚至忘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那也根本行不通。邓小平同志正是根据我国的国情统筹兼顾了效率和公平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

（二）“全国一盘棋”的观念

在新形势下，对“全国一盘棋”应当有新的认识。一方面局部要服从全局，地方要服从中央。有些事情局部看来是有利的，但从全局考虑未必有利，应当坚决服从大局。另一方面，中央考虑全局时，要适当兼顾地方合理的利益。我到二滩水电站考察，这个水电站是国家花了大量投资建起来的，可是实际发电能力达不到 50%。我去时见到泄洪坝大量放水，等于把钱扔到水里，

真令人心疼。原因是相邻的省份要发展火电，或者原有的火电不打算关掉。我认为在保留必要的调峰火电的前提下，对那些技术落后的，污染严重的火电应该坚决淘汰，把二滩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时拿出一部分利润通过中央转移支付，适当补偿因为火电下马带来的地方经济损失和工人失业。听说有的省民建组织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当然地方也有不少难处，光说一句关掉，不采取相应措施也不好办。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我们在开发资源时应考虑把与开发有关的收入适当留点给少数民族地区，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因此，在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上，对少数民族地区要尽可能给予照顾。总之，局部服从整体与兼顾各方利益，是真正能实现“全国一盘棋”的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三）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观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的战略目标。有的地方和部门总迷恋自己的所谓权力，想通过立法保护本地方、本部门的既得利益，这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维护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权力与责任的平衡，而且要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有些省在西部大开发中作了庞大的规划，计划投入的资金加起来大概国家三十年财政收入都不够付给。有些省还提出来要建多少个百亿以上的超大型集团、十亿以上的大型集团。我们听了汇报不禁问：你是想靠政府建吗？再说在一个省、一个市建那么多集团现实吗？可见我们有些政府官员还不习惯真正接受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我和几位专家合著了一本书《政府如何管理企业》，其中讲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单靠市场也不行，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特别在涉及保障社会公平的时候，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目前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的作用强调得比较多一些，对市场的作用重视不够，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四）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命题是中共十五大提出来的，而且经过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写进了宪法。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是都完全到位了？我看还需要深入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的。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是把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总觉得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这就错了。我专门到浙江、广东、福建作过调研。浙江的张德江书记认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柴松岳省长的比喻很生动，他说原来一家有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养家，拖家带口，包袱很重，给老爹老妈交不了多少钱，弄得不好还占老爹老妈一点便宜。现在二儿子三儿子都能养家了，老爹老妈手里钱多了，还能给大儿子补贴一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企改革不是提出“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组成跨所有制的集团不是有钱了吗？至于下岗的人当然不会全分流到非公有制企业里去，一部分会被非公有制经济接纳和吸收。虽然浙江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并没有萎缩。浙江的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为10.8%，但总量相当于四川省，净值相当于吉林省，而四川、吉林省的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非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大家互不相干，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股权多元化，就是通过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西部地区有些地方这种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整个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比例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改变这种现状。如果思想不解放、观念不转变就不可能有突破，必须真正认识到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肯定是不行的。

二、要大力培养人才提高人口素质

西部大开发需要大批人才。就西部地区总体而言，人才相对缺乏，文化素质、教育水平较低。我认为人才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

首先是政府官员。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仍在起着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官员是国家各项政策的执行者，提高他们的水平和素质的意义就更重要。第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郑板桥曾写过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唐朝的韦应物也写过“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诗句。我觉得古代的官僚尚且还有这种意识，我们新时期的政府官员更应该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积极地去做好工作。当年我们曾经学习过焦裕禄同志，他那种负重拼搏、艰苦奋斗，带领兰考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今天仍然是需要的。第二，要提高政策水平。西部地区要吸收东部地区和国外的资金、技术，需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怎么去吸引人家？有的地方签合同的时候，谈的是如何给予优惠，等人家赚钱以后就觉得吃亏了，要收这个费那个费，或者要赞助点什么。投资者看你说话不算数，下次就不来了。其实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也有不少困难，如情况不熟悉、子女入学不方便等，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第三，决策水平也相当重要。我们有些同志习惯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说“没问题”，出了问题就拍大腿“哎呀，怎么我没想到？”最后拍屁股走路。有个地方葡萄酒厂还不知在哪里，就号召农民种葡萄，1999年种出来就没人要，2000年还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我在葡萄园问农民怎么办，农民说肯定要赔钱。这种决策水平怎么行呢？当然我讲的是个别事例，但是很值得重视。

第二个层次是专业人员。广义的包括经济管理、科研技术等

方面。要用好本地人才，本地人才都跑了，再引进外地人才谈何容易。据我了解，某省有个专家因为所在学校对待他不公正，只得含泪离开调到上海，被安排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个专家在他研究的领域里是全国拔尖的，这个省的省长感叹地说：这样的人才我们竟然没有留住。如何改变“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东南飞”的现象？关键要在用人的政策上突破，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和环境，注重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士为知己者用”，领导同志要与专家建立感情，让他有大显身手的机会。有些人条件再艰苦，也愿意干一番事业。当然待遇问题也应当重视。不要单纯依赖从外面引进人才，远来和尚念的经不见得比本地的和尚念得好，本地人才对情况相对比较了解，要把用好本地人才与引进外地人才结合起来。我很赞同有位同志提出的对人才要“不唯所有，但求所用”的观点。

第三个层次是企业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是搞不起来的。我们经常谈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微观层次就是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等。企业要是搞不好，宏观经济怎么可能搞好？一个企业搞好搞坏，与一把手的关系很大。从事过政府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一个企业一把手选好了，不用多费劲，你的想法他能理解，他认为正确的就去执行，他认为与实际不一致的就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如果一把手选得不好，就完全不同了，不是今天有告状信，就是明天出个什么事故，再不就是领导班子不团结，领导上整天要给他们去协调。因此，企业家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光有技术人员还不行，要有一批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要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

第四个层次，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质要提高。有的地方拨下去的钱，有些老百姓拿去买酒喝了，并没有用来改善和发展生产，真正用于脱贫，这不能说同素质没有关系。我认为西部

地区最终要赶上东部地区，一定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水平。

三、多渠道筹集西部大开发的资金

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搞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科技教育都离不开钱，没有钱办不成事，这也应该实事求是。

我认为资金要靠四个方面来努力筹集：

第一，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区发展，这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下了决心的。但是中央的财力终究有限，中央财政税收虽然年年增加，比原来吃饭财政强一些，但中央补贴地方每年总共只有 2000 多亿元，这么多的省，大概一个省平均一、二百亿元。因此，向中央要钱，也要优选项目，不是急办的事，恐怕也办不成。

第二，依靠自我积累。在这方面，有些地方想了很多挖掘潜力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宁夏中药厂打算整体搬迁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去，需要 1.2 亿元，钱从哪里来？他们的办法很好，第一，企业原来有些积累可以用上。第二，职工集资作为股份。第三，现在的厂址位置很好，可以利用级差地租，转卖出去。第四，吸引其他企业参股，争取上市。他们千方百计通过挖掘潜力，实现自我发展的思路值得借鉴。当然也不是不要钱就好，适当搞一些银行贷款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家都不找银行，银行赚不上存贷利率差，那就要关门了。西部地区还应当充分挖掘资本市场的潜力，扩大建设资金来源。

第三，依靠东西部合作。东西部合作不仅是筹集资金的渠道，而且是实现技术转移、提高管理水平的手段。我在重庆涪陵看到两个东西部合作项目，办得很有起色。一个是娃哈哈在那里

搞了个分厂，由浙江投资和管理，效益很好，现在还在扩建。目前除了总经理，都用了当地人。另外一个白猫洗衣粉，也搞得不错。应当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家到西部去，在比较合理的条件下，提供比较优惠的政策，让他们开办企业。办企业总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赚钱，以后谁也不会去。我认为，西部地区通过东西部合作可能要比引进外资更有效。这些年来，民营企业有些积累，办得好的国有企业也有积累，目前我国银行存款有 9 万亿元，其中单位 3 万亿元，个人 6 万亿元，超过了历年引进外资的数额，我们国内有那么多的资金，要积极调动和鼓励民间投资投向西部，推动西部开发。

第四，积极引进外资。以前西部引进外资的比例相当小，这方面也有很大的难度。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潜力大，是有利条件，应该积极改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吸引外资。宁夏的“小巨人”引进就很成功，而且是世界第一流的技术。这方面西部地区还要下很大的力量。

四、科学规划 突出重点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世纪工程，既要有长远的发展蓝图，又要制定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省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别很大，开发不可能全面铺开，一定要科学规划，选准实施重点，集中财力、物力，解决关系西部地区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资源、生态、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突出重点也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西部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已经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很重要。现在全国对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呼声很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退耕还林（草），禁止砍伐上游的森林，还有宁夏不让挖发菜了。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单纯

依靠国家拿钱保护生态，也不是长久之计。例如退耕还林，种什么树就是一门学问，选择什么树种既能保持水土，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就很值得研究。又比如禁止挖发菜，宁夏贫困地区原先依赖挖发菜的群众，据说一户年收入大概是 2000 元，禁挖以后如何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其他措施，他们还会偷偷挖，然后去黑市卖。所以光堵不完全解决问题，还要想办法疏导，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另外，不利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我记得钱学森同志很早就提出沙产业的概念，提倡种植一些沙生植物，如沙棘、麻黄等，既有经济效益，同时也达到了治沙的目的。我们不能按国外有些唯生态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什么先进的工业都不要搞，甚至汽车也不许开，最好回归大自然去。我们要保护生态，第一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第二应该力求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考虑。生态环境建设要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广大农民生活紧密相结合，使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也是重点。我在西部看到有些高速公路修得很好，但没有几辆车在跑，这就可能过分超前了，修路的投资何时能收回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赤字本身是有一定风险的。政府向银行借钱搞建设，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效益很低，不能收回投资，那就会影响金融安全，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实行下去。朱总理在 2000 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也再三讲过，不能敞开口子花钱。我认为交通建设，一方面要注意公路、铁路、水路、空运之间的相互配合，哪方面有优势就往哪方面发展，不一定求全；另一方面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是不宜过分超前，各地在研究规划的时候应抱着科学的态度进行充分论证。

西部的资源开发，最主要的是水和能源的开发利用，目前选定的项目，一个是南水北调，一个是西气东输。西北地区的水资

源比较短缺，现在马上实行南水北调西线方案，从青海源头调水很不容易，原因是工程量相当大，而且土质不行。我赞成局部先修一些水库，如宁夏的大柳树水库，争取改善局部条件，然后再考虑西线调水工程。同时西部要提倡实施节水农业，推广节水灌溉。以色列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技术比较先进，也很有成效。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面临缺水，另一方面农业大水漫灌浪费很严重，因此水资源的开发应当与节水并重。西部能源很有希望，特别是天然气。宁夏化工厂的第一套装置是渣油气化，现在马上要改成天然气，天然气一立方只有七角钱，再上一套天然气制化肥装置的话，肯定就是全国最大的化肥厂，而且成本最低，效益居全国之冠。西部地区要利用能源优势来发展西部地区的工业，能源结构也应当因地制宜，作适当调整，有了天然气，有了电，少用一些煤，可以减少大气污染。

最后是科技和教育，这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点，科技管明天，教育管后天，应该说西部大开发，科教先行是有远见的，这样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的知识差距。

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

—成思危—

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作出重要决定，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国有企业的关怀和重视，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我个人体会基本上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1986 年，这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但政府在对企业管理上，还没有跳出传统计划体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第二阶段从 1989~1992 年，这个阶段主要是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各地兴起搞承包的热潮，企业通过承包经营，确实得到了发展。但是总体来看，由于承包经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和经营机制的问题，引发了一些短期行为，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经营者考虑短期利益，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不愿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工作，比如技术开发就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个别地方甚至靠出卖国有资产来取得表面上的经营绩效，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还为后续经营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阶段是从 1993 年以后至今，主要强调公司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整个国企改革过程来看，应该说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收效不太显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国有经济的增长看。1993~1997 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大概增长 28%，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 163%，其他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 425%。虽然都在增长，但是国有企业的增长率明显偏低。虽然国有工业原来基数比较大，适当低一点是合理的，但是低得太多就说明有问题了。到 1997 年底，国有企业总产值只占全国企业总产值 1/3 还弱一点。

第二，国有企业亏损在增加。1987 年国有企业亏损额是 61 亿元，1997 年是 831 亿元，占 GDP 将近 6%，实际上 1997 年亏损额已经超过了 1997 年的财政赤字。2000 年以来，特别是 2001 年，经过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减息、出口退税等措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在好转，但总体来看，亏损问题不能忽视。有的地方国有企业还比较困难。

第三，上市公司国家股比例在降低。证监会把握上市公司很严，一般非公有制企业很难上市。但是，上市公司国家股为什么降低？主要是有的上市公司经营不善，被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买壳收购。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我国多年对上市实行审批制，上市成本很高，而买壳成本比审批低。1994~1997 年 4 月，上市公司国家股比例从 42.7% 降到 35.93%，现在是 30% 左右。

从上述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迫切的。我们不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可能会影响到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前途。

中共中央为四中全会下了很大力量，总书记亲自召开六个座谈会，到各地听取意见，最后形成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指导意义非常重要。

我个人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艰巨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职工，这三部分人的目标不是完全一致的，怎样把企业内部人员的目标集中统一起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企业的经营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

响，所以，有生有死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去美国硅谷了解过，每年有一千个企业创立，大概有三百个企业破产，是动态的。世界五百强，最近刚在上海浦东开会，如果从一百年历史来看，一百年前的五百强现在只剩下 3% 多一点。

第二，国有企业对政府过分依赖。以前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老板，又是婆婆，企业有问题找政府，形成“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增不能减，福利能升不能降，企业能生不能死”。这样就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适应了。

企业由于多年依赖政府，没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拼搏的能力。有人说，我们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准官员，很大精力放在和政府、银行搞关系上，即所谓“跑部钱进”，要批文、要贷款，而企业内部加强管理方面考虑得很少。朱镕基同志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大部分是不合格的。这句话引起了国内一些厂长、经理的意见，但我认为他说的是大实话。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确实对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了解得很不够，对财务、会计、资产经营、资本市场、企业评价等都了解不够。

第三，国企改革正处于转轨时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这包括思想观念的转变，经营方式的转变，企业文化的转变等，这个过程会产生很多问题，还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地能解决的，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有步骤地加以处理。

转轨本身还有一个“路径依存”的特点，就像下象棋一样，第一步走得不好，会影响到第二、第三步。改革也是这样，有些改革实际上是走了弯路。比如说承包经营引发了短期行为。利改税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把利和税的概念混起来了，把国家是老板还是婆婆的概念混起来了，利润是企业经营的绩效，税是企业对国家的责任。把利全部改成税，企业经营者就没有积极性了。

实行了一段，后来又改回来了。这都说明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的。不但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都需要探索。

复杂性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国际竞争的加剧。近十年来国际上企业管理的水平提高非常快。主要表现就是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管理有很多创新。

上述四个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性。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性和复杂性，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内容丰富。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可以把这个内容分为四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是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和调整。第二是股权结构的调控。第三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第四就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第一个层次是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和调整。这里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四个方面，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方面，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服务的行业，还有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里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方面说得很清楚，主要是重组、调整、提高素质。其他方面并不要求国有经济控制。

要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

第一，要允许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现在国有经济分布这么宽，如果在每一个行业都要占主导地位，占 51%，国有经济现在只有 4 万亿元资产，引进外资，非公有经济，最多不能超过 4 万亿元。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认识不解决是不行的。在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素质提高这三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数量的减少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理论上很重要的突破。

我最近到浙江调研，张德江书记告诉我，浙江是非公有制经济最发达的，国有经济只占 10.89%。但是国有经济的总量相当

于吉林省，国有经济的净资产相当于四川省。虽然比重低了，但是总量不小，实力也不小。另外，重要的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国有经济的手上。如果我们总是怕国有经济比重减少，就不能搞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了，也没有办法能够更快地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了。

第二，要允许国有资产合理流动。这也是《决定》里说的。现在有些人把国有资产的流动和流失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国有资产的流动是从一种形式向另外一种形式的转化，比如说从固定资产形式转化为货币的形式，只要这个转化过程没有有意低估国有资产，就不能叫流失了，要负责任。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国有经济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分布。

国有资产究竟怎么定价？要根据市场的规律来定。国有资产的价值不是光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的结果来看，还要根据市场价值来看。政府通常希望评估得高，但是评估得过高就没有人买，这样也无法流动起来。

第三，要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里，我们讲共同发展，并不是说大家都独立、平行的发展，而是要共同、融合式地发展，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把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看成是一个互相排斥的过程。事实上不是这样。浙江省以前在单一所有制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单纯依靠国有企业利税收入。企业有困难，就让银行贷款给企业，企业拿贷款交税。这样给企业造成很大压力。而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今天，浙江省的财政收入 $2/3$ 以上是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来的，国有经济的压力就减轻了。

另外，国有企业要完成股权多元化的改造，钱从哪里来？应该说，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相当一部分。精简下来的人往哪里去？一大部分也将由非公有制经济消化、吸收。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并非势不两立，而是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

不解决这三个认识，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叫做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我个人的看法，这里的核心是股权结构的改组调整。《决定》里主要谈了两部分意思，一个叫区别对待，一个叫抓大放小。

所谓区别对待，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国家支持，一种是多方投资，一种是兼并联合，一种是破产关闭。根据企业的效益等各方面情况区别对待。不管怎么对待，都涉及股权变化。

抓大放小也是这个问题。加强骨干企业，建立企业集团，涉及股权结构的变化，放小也有股权结构的转换。

总体来看，国有企业所谓战略性改组，核心是股权结构的调整。《决定》第五部分有一句话，说股权多元化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除了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要这样，不这样，企业从哪里来的问题解决不了，全靠国家不可能。

股权多元化的方式目前是四种。

第一种是债转股。80年代搞了拨改贷，把国家给企业的拨款变成银行的债权，由于各种原因，坏账比较多，现在把银行债权转为股权。从效果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账面上降低银行的坏账率，坏账变成了股权，交给了资产经营公司。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给企业喘息的时机。因为企业现在还本付息负担很重，而债转股以后，企业不用还本付息，但赢利时要给股东分红。这样通过减轻企业负担可以将一些企业救活，以后国家允许企业回购股权，可以再发展。当然也可能有些企业没能救过来，企业一死，国家的股权也就完了。目前有很多企业对债转股非常热衷，有的地方几百个企业排队要求债转股。有人认为这是一棵救命稻草，我说它是强心针，要看到风险，慎重对待。

第二种是股份合作制，即所谓职工持股，把一部分国有资产

卖给职工。

第三种是引入其他经济成分，变成股份制公司。有的甚至被非公有制企业收购，这样股权结构就变了。

最后一种是上市，把国有股变成法人股或者公众股，也是一种结构的变化。现在也有企业把上市当成救命稻草，这也有风险。一是信息披露不真实，简单说就是弄虚作假。二是大户操纵，把大量散户股民套住。这些都将使股票市场的风险增大。

以上四种方式应该说都是实现股权多元化的重要办法。每一种都有利有弊，我们要权衡取舍。

第三个层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现代公司制，现代公司制的核心是法人治理结构。根据现代产权理论，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市场结构，一个是企业行为。市场结构是外因，企业行为是内因。

企业行为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家的素质，一个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包括企业文化等等；一个是企业的经营战略。关于企业家素质，《决定》里专门有一段话，经营战略是放在加强管理里讲的。所谓企业家的素质，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素质就是我们常讲的德能勤绩。动态素质是指他的积极性。要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才能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

内部的经营水平和经营战略都和企业家的素质有关。这三个因素我们再深推一步，都受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什么叫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是产权清晰。产权就是财产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的分配权。还有一种理论，觉得产权还要包括控制权和决策权，控制权是任命企业高级经理的权力。公司治理结构本身是制度安排，实际上决定了权利的分配。也就是什么人能在什么时候拥有收益控制权和分配权。从这点来看，治理结构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产权安排是否合理。

从企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来。自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